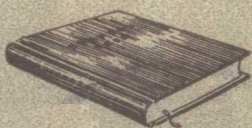


出版社的任務

沃倫錯夫等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出版社的任務

沃倫錯夫等著

溫 頌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出版社的任務

沃倫錯夫等著

溫 穎等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

1954年7月北京第一版

195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33 $\frac{1}{2}$ ×46 $\frac{1}{2}$ 1/32·56,000字·總號1079·分號Q629

1—7,000冊·定價1,900元

*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目 次

書籍出版社的迫切任务	甫·沃倫錯夫(1)
多出版好的政治書籍	蘇聯“真理報”社論(19)
出版社的選題計劃與書籍發行機構 的任务	“蘇聯書籍貿易”雜誌社論(21)
更好地滿足勞動人民對書籍的需要	塞·波力萬洛夫斯基(26)
報刊稿件的文字編輯與校正工作	貝琳斯基(30)
附錄：三十五年來的蘇聯圖書	(52)

書籍出版社的迫切任務

甫·沃倫錯夫

書籍在蘇維埃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特別大。在蘇聯，書籍是普及政治知識和科學知識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是提高勞動羣衆的文化、政治水平以及對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有力武器。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人們從幼年到老年，一生都離不開書籍。在我國，由於識字人數的衆多和文化的廣泛擴展，書籍已成為人民的重要必需品之一。共產黨爲了全面地、充分地滿足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需要和要求，總是在盡一切可能爲人民出版更多的優良書籍。

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在擬定我國進一步發展的計劃時，也確定了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方面的重大任務。大會責成黨組織要重視思想工作，不斷地提高、改進對幹部和全體共產黨員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進對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工作。黨總在盡量大力提高思想工作，利用我國文化中的一切工具來爲共產主義建設服務，總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宣傳水平和在羣衆中的政治鼓動水平，以及科學機構、文化教育機構、劇院、電影院和廣播的作用。提高思想教育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進一步改進包括出版社在內的蘇聯出版事業的工作。

充分滿足人民對書籍的需要

由於黨和政府經常關心蘇聯人民的政治和文化的提高，我們一年一年地出版越來越多的書籍。一九一三年俄國出版的書籍，總數爲八百七十萬冊；一九四〇年蘇聯却出版了四億五千一百七十萬冊，即增加到五倍多。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出版工作縮減了。但戰後書籍出版數量又開始不斷增長，一九五二年已經達到八億五千一百五十萬冊，比戰

前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八點五，比革命前俄國幾乎增加到十倍。

在戰後年代中，出版了很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用蘇聯各民族文字出版了三億五千餘萬冊（包括全集在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在出版大、中、小學教科書和各種生產技術學校與訓練班的教學書籍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最近八年中，出版了三萬一千多種教科書，印數達十二億七千二百萬冊，佔蘇聯在這幾年中出版書籍總印數的四分之一強。文藝書籍的出版數量也顯著增加，一九五二年為一九四〇年的四倍。

在最近幾年內，書籍和報紙的出版數量還會大量增加。蘇聯政府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來增加紙張的生產，發展印刷工業，在雅羅斯拉夫里、加里寧、薩拉托夫、明斯克及其他城市中建立強大的印刷企業。最近，蘇聯出版的全部書籍每年的印數就將達到十億冊。

蘇聯的出版事業正在發展。但是不能忘記，蘇聯人民對書籍的需要是很大的，對出版社的要求正在增加。在這裏，問題就不僅在於增加書籍出版物的數量，而首先並且主要是提高書籍出版物的質量。出版社的責任是不斷改進自己的工作，使能適應目前情況下思想教育工作的任務。蘇聯人民精神上的需要是非常廣泛的。他們的求知慾以及對科學的興趣是沒有止境的。出版社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充分滿足勞動者對書籍的需要。

應當大力出版傳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偉大學說的羣衆政治讀物，宣傳黨中央委員會和蘇聯政府所採取的、旨在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國家威力和提高勞動者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的一些措施的書籍。我國出版社出版的書籍，應當把蘇聯人民的思想武裝起來為建設共產主義而奮鬥，應當用具體事例說明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應當教育勞動人民相信共產主義的勝利，教育他們忠於黨和社會主義祖國，教育他們明瞭蘇維埃愛國主義和蘇聯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教育他們具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以及與世界各國勞動人民建立兄弟般友誼的精神。

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的責任特別重大。黨中央委員會交給它一個

任務——在最近期間出版一套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問題的優良的通俗小叢書。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擬定的叢書計劃，已在莫斯科市區委會宣傳員、圖書館館長、斯大林工廠鼓動員以及“鐮刀和錘子”工廠和“地那莫”工廠工人的許多會議上討論過。預定出版的、廣大讀者所必需的小冊子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勞動者的學說和旗幟”、“怎樣認識世界”、“什麼是帝國主義”、“為什麼帝國主義產生戰爭”、“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歷史的根本轉捩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法則”、“什麼是共產主義及怎樣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蘇聯共產黨是蘇聯人民偉大勝利的鼓舞者和組織者”、“共產黨對黨員的要求”、“蘇聯怎樣變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誼”、“蘇維埃愛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等等。

由於科學、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科學技術出版社就應當多出版通俗科學書籍和生產技術書籍，積極宣傳國民經濟各部門革新者的經驗，如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所說：“以便在勞動戰綫上有愈來愈多的人向我們社會的先進工作者看齊”^①。需要千百萬冊關於一般技術原理和工、農業各方面的通俗讀物和教科書。書籍應當在我們偉大的全部建設工作中起積極的作用。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向文藝工作者提出了高度的要求，要求他們寫出更多的對我們蘇維埃人有價值的、能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需要的作品；給蘇聯作家提出的這個戰鬥任務，也不能不認為是出版社的頭等重要的工作。

必須大力出版羣衆美術出版物。也需要出版印製精美的彩色招貼畫，來反映國內和國際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宣傳國民經濟和文化上的各種成就，推廣工農業先進工作者的經驗。蘇聯人民非常需要美術畫。但是招貼畫、美術畫、畫冊、圖片都出得不多，而且往往水平很低。改進羣衆美術出版物的出版工作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出版社必須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根據蘇維埃制度的生命基礎的共產黨的政策，緊密地結合着發展國民經濟、科學、文化以及開展勞動人民

①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七七頁。

的共產主義教育的根本任務。早在一九三一年黨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關於出版工作”的決議就曾指出：“出版社必須及時考慮工人、集體農民、知識分子以及各種專業和各種程度的學生等階層對書籍的需要，並分別予以滿足。”

除了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以外，蘇聯的書籍和出版社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其他的利益的。每個出版社都應當與羣衆保持密切的聯繫，不能脫離實際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成績決定於工作安排的是否具體，在解決書籍出版問題時，對於出什麼書，爲哪些讀者出，怎樣出，印數多少，某些書應當約請誰來寫等問題都應考慮到。

因爲蘇聯的書籍——共產黨進行思想工作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具有巨大的社會改造作用，所以書籍出版計劃工作是具有重大的國家意義的，出版社和領導出版社工作的機構和組織，對於這項工作必須經常加以注意。

編製書籍出版計劃是具有國家意義的工作

出版計劃決定出版社工作的各方面：工作方向，內容和範圍，目的性和積極性以及作者人數；總而言之，從這個計劃可以看出每個出版社的全貌。選題計劃好像一面旗幟，出版社在這面旗幟下在思想戰綫上前進。

同時，計劃也是出版社用來組織全部工作的武器。書籍出版計劃和各種重要工作一樣，必須嚴格遵守既定的原則，慎重執行。首先不能用閉門造車的辦法進行這個工作。書籍出版計劃必須交給黨的、蘇維埃的和社會團體的會議以及讀者會議廣泛討論。出版社必須跟圖書館和書店保持密切聯繫，因爲讀者們經常在那裏提出他們的希望、要求和建議——出什麼書，怎樣出。

經驗證明，出版社不能局限於目前的計劃，不能局限於制訂一年以內的選題計劃。還應當制訂幾年的長期計劃。要向前看，看到明天，認清本身工作的基本路綫。每個出版社需要這個就像需要空氣一樣。長期計劃和短期計劃的區別，不僅在於長期計劃包括幾年而短期計劃包括一年或更短的時間；半年、一季或一月。實際上這種差別是很大的。長期計

劃是指出版社準備編寫的書籍的工作而言，年度、季度選題計劃基本上是已經編寫完成的書籍的出版計劃。編寫書籍，特別是編寫某科知識的叢書所需的時間，比較印製的時間要多，有時需要一年以上。因此，沒有長期計劃是不行的。如果出版社輕視長期計劃，盲目地工作，那就不能出版好書，甚至不能正常地工作。選題計劃如果根據毫無計劃地收到的稿件和著作人的申請來編製，那就等於把它建築在鬆散的沙地上。

必須承認，有許多出版社對待書籍出版計劃抱着敷衍和不認真的態度。工作中缺乏明確的路綫和遠見。通常都沒有幾年的長期計劃。短期選題計劃往往只是出版社少數工作人員編製的，他們始終看不見廣大的讀者。供給各階層人民的通俗的和羣衆的讀物出版得很少。

計劃中還存在着顯著的缺點。如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的選題計劃中，很少解釋和宣傳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決議的書籍和小冊子，關於說明黨的領導和指導作用的羣衆性小冊子幾乎沒有，關於黨的建設這個主題也沒有列入。在介紹企業、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農業機器站黨組織工作的經驗方面，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沒有起絲毫作用。它沒有約請黨的工作人員編寫這些主題的書籍。脫離了與實際、與生活有密切聯系的黨的工作人員，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的老毛病。自然，出版現成的學術論文是非常簡便的事，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就專找這種事做。但是我們的出版工作不應該爲自己選擇簡便的道路，而應該走最符合人民需要的道路。

科學院出版社對於爭取提高書籍的現實性做得不够。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今年準備出版二十六種書籍，沒有一種跟蘇維埃時期的歷史有關。科學院出版社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出版情況也不好。他們預定出版的通俗讀物只是着重古代方面的，例如“原始文化簡史”、“吉若爾達諾·布魯諾與宗教裁判所”、“耶穌會教士”等書。

農業書籍出版社跟不上生活的要求，不能完成農業書籍出版的主要任務，一九五二年全年只出了七種關於合併的集體農莊經濟的書籍。給農業機械學校和農畜飼養訓練班出版的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土壤、灌溉、農林土壤改良、畜牧、牧草穀物輪種制和蔬菜種植等方面，缺乏最新的科學材料的書籍。讀者在這方面有許多抱

怨，是完全有理由的。這首先要由農業書籍出版社來負責。

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有許多邊區、省和自治共和國的書籍出版工作是無組織的，實際上是盲目的。出版社的選題計劃往往是爲了應付差事，按這種計劃辦事是行不通的，因爲這樣的計劃根本沒有穩固的基礎。例如，我們分析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十八個省的出版社（其中包括列寧格勒、沃龍涅什、克里木、土拉、加路格等省的出版社）的選題計劃時，就發現有這種情況。這十八個出版社計劃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一千八百三十二種書，但現有的可以出版的稿件只有二百五十六種，其餘一千多種計劃出版的書還不知道找誰來寫。因此幾乎全部計劃是用官僚主義的方式編製的，只有臆造的書籍和小冊子的題目；這樣編製的計劃中，大部分書籍和小冊子是註定不能出版的。如果計劃中所列的出版物大部分沒有現成的稿件，就會使出版社的工作陷於中斷，出版社將無法仔細檢查書籍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將使印刷廠的工作失去平衡，將使出版社把一些偶然收到的和沒有加工的不成熟的稿件拿去付印。

這樣編製計劃的結果，就使出版計劃，特別是地方出版社和所謂機關直屬出版社的計劃不斷變更，年年不能完成。一九五一年，煤礦技術書籍出版社的選題計劃變更了三次，從計劃中刪去了將近七十種書，其中有些正是煤礦工業工作人員十分需要的。一九五二年，煤礦技術書籍出版社的選題計劃也變更了好多次，刪去了五十四種迫切需要的書籍，如關於採煤、豎井建設、選煤、煉焦以及生產經營和組織等問題的書籍。

當然，也不能把選題計劃看做是教條。出版社應當創造性地處理工作。當工作需要和讀者羣衆需要的時候，它可以甚至必須重新審查年初編製的選題計劃，加以修改，在計劃中刪去一些小冊子，用另外一些生活上需要的書籍來補充。但是，只有在使原計劃更好而不致更壞的情況下，才能進行修改。同時，如果要修改，就必須事先通知審查和批准選題計劃的機關，經同意後，再有組織地進行。否則，出版事業中就會沒有紀律，而出版社像其他任何蘇維埃機關一樣，是應當有紀律的。

爲了使計劃不致變成一紙空文，而是切實可行的計劃，出版社就不應當把編輯計劃的編製與書籍出版選題計劃的編製混淆起來。編輯計

劃可以包括著作人申請編寫的稿件、約人編寫的稿件以及編輯中和準備編輯的稿件，而出版選題計劃必須嚴格地以準備好的和準備付印的稿件做基礎。把還沒有人編寫的書列入出版計劃，呈請批准，實際上就是欺騙。這種現象在出版工作中相當普遍，必須向它作堅決的鬥爭。

不論中央或地方出版社都普遍存在着一個缺點，就是在決定書籍印數時缺乏制度。有時候顯然是爲了著作人的利益而提高印數，這是因爲著作人跟出版社的工作人員有朋友關係；而有些書却毫無根據地把印數壓低，結果就在不同程度上不能滿足讀者對這些書的要求。某些書有很大一部分長年累月地積壓在倉庫裏，而出版社却不負任何物質上的責任。這種情況就會造成混亂。現在應當建立一種制度，使出版社不僅要出書，還要幫助發行，如果出版的書不符合讀者的需要，也要負物質上的責任。同時還應當責成出版社把一些印數有限的、有價值的書打成紙型，以便隨時根據讀者的要求重版。

不正確的計劃會使書籍市場出現當前並不急需的書籍，也會使許多書籍和招貼畫的印數過大，大部分銷不出去。例如：國立林業造紙出版社積存了大批銷不出去的一九四六——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書籍；國立財政書籍出版社、國立文化教育書籍出版社、農業部和採購部的出版社、“藝術”出版社和“蘇維埃科學”出版社，都積壓了大批書籍。由於出版社的一些領導者無能，有時由於對工作不負責任，造成紙張的大量浪費，把國家的巨額資金付諸東流。

這一切充分說明，必須堅決克服編製出版計劃中的缺點。出版社一方面必須增加政治、科學和文藝書籍的出版數量；同時必須有目的、有組織地工作，嚴格地遵守已經確定的出版計劃，在規定期限內無條件地把它完成。

依靠優秀的創作力量

出版計劃的編製應當與出版社選擇和培養作家的的工作密切聯系。否則，計劃的編製就會完全失掉實際的意義。出版社只有依靠廣大的作家才能完成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向它提出的任務。

蘇聯文學界新的創作力量年年增加，我們親眼看到著作幹部的迅

速增長。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和一般寫作的人把自己的稿子交給出版社，就是希望出版社仔細地、慎重地審查，他們認為出版社，首先是編輯，是公正的和熟練的文學鑑賞家，是關心他們的，是幫助他們的。

整個看來，出版社在選擇和培養作家方面，是做了很多工作，給了他們很大幫助的。不少工、農業的革新者，由於出版社對他們的關懷，已經能在小冊子裏詳述他們的生產經驗，向廣大讀者介紹他們的成就。許多出版社很可以自豪，由於他們直接地和積極地做了這些工作，作家、學者以及工人和集體農民便寫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書籍。數千個作家也親切地談論着過去和現在幫助他們為人民寫作的樸實的出版工作者，其中包括編輯、書評家和顧問。

出版社在培養作家的工作中積累的經驗，應該加以總結和推廣。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文化部出版管理局不久以前出版過一本小冊子“怎樣組織作家”，敘述了齊略賓斯克省出版社的工作經驗。這個出版社掌握着一個原則，就是仔細選擇每一本書的作者，並且從作者動筆的時候起就細心地幫助他。通常，在選定作者和確定題目以後，出版社就請作者提出寫作大綱（計劃）。出版社跟作者討論寫作計劃以後，在作者整個寫作期間，編輯與他保持經常的聯系，經常提出自己的意見來幫助他。稿子交到出版社，經過審閱，如果發現有缺點，就把原稿連同具體的建議退還作者修改。如果沒有顯著的缺點，就把原稿交去評閱，並要求詳細分析原稿。此外還對原稿進行集體討論。斯大林獎金獲得者鏟工沙芬柯夫同志所寫的小冊子“快速技術”，曾由作者所在的烏斯奇卡塔夫工廠全體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討論過兩次。第一次討論時，提出了很多意見，作者作了很多修改。第二次討論時，全廠一致通過，推薦出版。某些小冊子在出版以後還經過讀者會議討論。這種會議對出版社、作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好處。

可惜並不是每個出版社都已十分注意選擇作者、培養作者的工作。出版社工作人員常常對作家，特別是對新進作家，採取官僚主義的、不近人情的態度。下面就是一些例子。早在一九四七年，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與費多羅娃同志訂了一個出版合同，出版她的“社會主義勞動在對羣衆進行共產主義教育中的作用”。這本書的原稿在出版社放了幾年沒

有動。作者屢次向出版社領導人員控訴，都沒有下文。過了五年，經作者向出版社指出這種拖延現象是不能容忍的之後，才把這本書出版。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這種對作者漠不關心的態度決不止這一次。一九五二年一月，巴什基爾師範學院哲學系主任馬斯連尼可夫同志把一部稿子交給了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該社編輯部主任貝洛夫同志把原稿寄到高爾基城請他的朋友去評閱，後來就把它忘掉了。而書評家却把原稿束諸高閣。在作者對於出版社這種不近人情的態度提出合理的抗議之前，一直有一年半沒有消息。

不能不指出，另外還有些出版社不願意與外地作家來往。以為只有在中央地區才能找到各種書籍的作者的這種陳腐想法，早就應當打消了。大家知道，我國正在進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工作，創作力量到處在增長。但是很多出版社經常以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態度對待外地作家。對於他們的建議不是裝聾作啞，根本不理，就是敷衍塞責，草率答覆。例如“蘇維埃作家”出版社，收到平扎同志的一部稿子“家庭、愛情、道德問題和文學”，就匆匆忙忙地通知作者說，這部稿子確實是很有趣的，但是因為不是文學理論著作，不能由“蘇維埃作家”出版社出版，應當由“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該出版社很需要這種稿子。後來作者又收到“青年近衛軍”出版社這樣一封信：“毫不誇大地說，你的作品確實是對這個問題精心研究的成果，你所搜集的材料很有趣，很充實，但是我們出版社不能出版你的作品。因為你的作品是一部文學理論性的作品，我們建議你投到‘蘇維埃作家’出版社去。”

出版社還遠沒有根除黨中央早就斥責過的根據親友關係選擇作者的惡劣作風。例如不久以前，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了高利采夫一本印數達幾十萬冊的小冊子“五一——國際勞動者團結的日子”。宣傳鼓動員是非常需要這種題目的材料的，但是他們在高利采夫這本沒有經過慎重考慮，倉促寫成，有嚴重錯誤的書裏沒有得到絲毫益處。實際上，像這種帶有指導性的書籍，出版社應當約請其他真正能勝任的人來編寫。現在弄清楚了，他們所以請高利采夫來寫這本關於五一的小冊子，主要是因為該社某些工作人員跟他是朋友。

出版社不能以為有了一部分著作家就夠了，不能以為僅僅審查自

由投稿就够了，而應當積極地尋找自己所需要的著作家，到中心區、省 and 邊區到處去尋找，把一切優秀的著作力量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中央出版社應特別注意研究地方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並以大的印數重版各共和國、邊區和省出版社出版的好書。

出版社和文藝團體應當不斷地關心培養青年作家。不能把文學看成僅僅是卓越人物活動的園地。就是所謂大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最好能記住契訶夫的這句話：“在文學中正像在軍隊裏一樣，小卒也是需要的……。”我們的文學之所以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文學，不僅是因為它的思想內容，不僅是因為它忠誠地為人民服務，也是因為它是從人民羣衆中間成長起來的成千上萬的作家所努力創造的。出版社應當注意著作家的全軍，不要僅僅注意所謂大將。

出版社一方面要擴大與作家的聯系，使積極的作家日益增多，幫助新的天才的成長，同時也要堅決而有原則地拒絕出版粗製濫造的著作。出版社周圍常常圍繞着這樣的一些人，他們抱着濃厚的自私自利的目的，隨時都準備寫，要什麼就寫什麼。薩爾蒂柯夫—謝德林曾用“揩油者”這個中肯的字眼形容這種粗製濫造的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一個外省人在彼得堡的日記”裏寫道：揩油者認為，自古以來文學就是不想拔掉一根寒毛的人的養老院，寫作並不需要多大的學問，只要有盡量多揩油水這一個願望就够了。這一類揩油的人一向是利用而且現在還在利用出版工作者缺乏原則性這個弱點。出版社常常成為粗製濫造者的贍養所。更糟糕的是由於出版社在選擇作者時的粗心大意，粗製濫造的作品竟以幾十萬、幾百萬的印數出版。

選擇作者，培養他們，幫助他們成長，這是每個出版社工作的基本原則。出版社如果不做這個對於他們說來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會感到稿荒，變成一個無事可做的衙門。

重要的書稿應該邀請把參加文學活動看做是為人民服務的作家來寫。要提高對作家的要求，同時也要對他們多多關心，通過編輯和書評家給每一個作家在工作上以具體的幫助，並採用集體工作的方式，例如：邀請作家開會討論長期計劃和選題計劃、出版社工作總結和個別書稿等等。

每一個出版社出版物的好壞，多半決定於與出版社有聯系、為出版社所依靠的作家。幫助作家進步，提高他們政治上的成熟性，提高他們的著作能力，是出版社的首要任務。

出版社工作的互相配合

生活和實踐早就提出了所有出版社工作應該互相配合的問題。這是監督和領導出版社工作的具有重大原則性意義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蘇聯，中央的、共和國的、邊區的和省的出版社共有二百多個。自然，所有這些出版社在工作上應當互相配合，以便共同來更好地完成國家交給他們的任務，同時也可使每個出版社在總的工作中各有其一定的地位，與其他任何一個出版社在工作上不致重複。

整個看來，我們所有的出版社構成一個全國體系，其中每個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具體任務。從這一事實可以肯定地得出一個結論：編製全國範圍的出版計劃是必要的。許多出版社不能因為受某機關的直接領導而妨礙這種計劃的編製。為了消滅工作上狹隘的本位主義，編製這種計劃是更迫切、更重要的。而許多所謂機關直屬出版社恰恰犯了本位主義的毛病。

按照書籍的主要門類編製總的全國主要書籍出版綜合計劃，是各出版社在工作上互相配合的既簡單而又適當的方式。這種包括社會經濟、通俗科學、文藝、兒童讀物、生產技術書籍的出版綜合計劃應該每年編製，並對所有的出版社和其中每個出版社加以詳盡的分析，作出具體的結論。綜合計劃的好處，首先在於它能夠提供明確的工作方向，指明關於哪些問題的書籍出版太少，應當增加。根據綜合計劃可以判斷各出版社的工作是否有不必要的重複，是否狹隘和片面。

綜合計劃的重要性是無可懷疑的。但是對於出版社選題計劃互相配合這一重大的工作，現在還沒有做。這項工作應當由出版總署來做，可是它只做了第一步，最近三年僅制訂了文藝書籍的重版綜合計劃。一九五一年以前，文藝書籍的重版工作是沒有組織的，每個出版社想出什麼就出什麼，想出多少就出多少。這就造成了一個最壞的結果：有些書籍由中央的和地方的出版社同時出版，而很多古典名著和蘇聯作家的

名著却印得很少。

下面只舉幾本俄文書籍的版數作例。蕭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出了五十版，共三百零六萬冊；卡維林的“兩個上尉”出了三十二版，一百六十三萬一千冊；布賓諾夫的“白樺”（第一卷）出了三十五版，一百六十六萬六千冊；畢爾文采夫的“榮譽從小培養起”，出了二十三版，一百零八萬五千冊；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出了三十四版，一百一十八萬八千冊。毫無疑問，這些書在勞動人民中間是大受歡迎的，值得極廣泛地發行。最好是成百萬冊地印行，用許多版次就應該反對。例如維爾新郭拉的“心地純潔的人們”一書，出版了八十一萬冊，但它無論如何也不需要出二十二版，畢爾文采夫的小說“榮譽從小培養起”也無需印二十三版；這本書要出版一百萬冊以上，印三、四版就夠了。版次多就證明出版社的工作還缺乏配合。出版總署對文藝書籍的重版很久沒有領導。由於出版總署的過失，書籍的重版工作，各出版社都做得不好，不合算，有時甚至浪費。因為書籍每重版一次，要花一大筆出版費和印刷費，並要對作者和書籍設計者支付稿酬。

統一計劃的編製，消除了文藝書籍重版工作的無組織現象。可惜社會經濟、科學、生產技術書籍的重版還沒有這樣的配合，給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只以各科學技術出版社為例，就可以看出這一點。科學技術出版社只在莫斯科就有幾十個。按理說，所有這些出版社應當是一根鏈條中的各個環節。但是實際上因為它們彼此沒有聯系，工作上各搞各的，印出來的東西常常是不合乎需要的。書店和圖書館很難滿足讀者對科學、技術書籍的需要。主要的各科技術參考書，如冶金、電工和建築方面的，差不多經常缺乏。司機用的書很少出版。喜歡無線電的人預訂的書不能很好地供應。出版推薦工業、運輸和電訊革新者的經驗的書籍原是科學技術出版社應盡的責任，而這類書籍的出版却完全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同時，其中有許多出版社忙於給它所屬的部印製通知、指令和各種各樣的指示。這一類資料的出版，在一九五二年達八千六百萬份，這十分清楚地說明了對機關資料有過分的、簡直是病態的迷戀。

出版社工作的不協調，使出版物常常發生重複。例如“材料力學”這

樣的書，大概高等技術學校裏有多少主講這門課程的人，就有多少種這樣的教科書出版。大多數主講某門課程的人都以為把“自己的講義”介紹給人家學習是自己的本分，而出版社也就怯懦地因襲了這種傳統。出版社之間的不協調現象，在他們出版技術方面的參考書時就暴露了出來。內容重複的書往往達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顯然，用不同的書名出版同樣材料的書是毫無必要的。

科學技術出版社工作中的這一切不正常現象，是由於彼此沒有聯系和缺少監督造成的。這種情況不僅說明了出版計劃沒有配合，而且也說明了對出版社實際完成的工作的總結缺乏深刻的分析。必須指出，中央書庫提供的豐富的實際材料，出版總署沒有加以分析，因而也沒有利用這種重要的材料來監督出版社的工作，例如對它們工作的實際結果作詳細和全面的評價，指出它們工作中的優點和缺點等都沒有做。

同時還必須有遠見。出版社在工作上經常和密切的配合不僅是預先把各出版社編製的選題計劃收集起來，加以審閱和分析，而且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各共和國文化部出版與印刷管理局應當堅決地領導制訂長期的書籍出版計劃，必要時向出版社提出具體的任務，要它編印某些書籍或某些小叢書。應大體上擬出新書選題，同時聯合各團體和機關的力量來保證寫好特別重要的書籍。

譬如，我們研究一下出版文藝書籍的問題。難道單靠某一個出版社的力量就能夠把與這個重要工作有關的一切問題都順利地解決了嗎？只有各出版社和學術機關共同的努力才能把它完成。但是出版社之間往往缺乏這種必要的聯系。

國立文學書籍出版社在今年預約發售的書籍的出版計劃中，應當供給讀者五十四部俄羅斯和外國古典作家的作品，如：列夫·托爾斯泰、果戈理、高爾基、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巴爾扎克、雨果、德萊塞、羅曼羅蘭和尼克索等人的作品。此外還有二十二部蘇維埃作家的作品，如：別德內依、巴甫連柯、庫巴拉、愛倫堡以及斐定等人的作品。如果從讀者需要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最低的計劃，但是這個計劃能否完成却大成問題。計劃中規定的七十六部作品，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總共只出版了二十部。